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臺灣研究論叢 1

臺灣經驗(一)——歷史經濟篇

宋光宇編

 東大圖書公司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臺灣研究論叢

臺灣經驗(一)——歷史經濟篇

————— 宋光宇編

臺灣經驗(一):歷史經濟篇 宋光宇編。——初版二
刷。——臺北市:東大發行:三民總經銷,2006
面;公分。——(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臺灣
研究論叢)

ISBN 957-19-1568-8 (平裝)

1. 經濟地理—臺灣

552.2832

82007555

© 臺灣經驗(一)
——歷史經濟篇

主編 宋光宇
發行人 劉仲文
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02)25006600
郵撥/0107175-0
門市部 復北店/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初版一刷 1993年10月
初版二刷 2006年10月
編號 E 540210
基本定價 伍元柒角捌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登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9-1568-8 (平裝)

序：臺灣研究的幾個特點

許 倬 雲

臺灣研究有其自己作的主體的意義，也有其在大格局中的意義：

臺灣研究的第一個特點是以整個中國文化作大背景，而發展出臺灣本地的特色。其特點是以臺灣這一個小珠子來看四週圍許多的珠子，四週圍區域的特點都可以反射到中央這顆珠子來，臺灣的歷史也就是以這許多發展形態的重新演過或修正，來發展其特色。例如以土地制度來說，在五千年中國出現過的現象，在臺灣也出現。土地制度本身可以歸納為「人多地少」、「地多人少」兩個原則，如以土地本身作為「所有權」的形態而言，在「人」、「地」分配的比例上的變遷，可以發展出不同的形式；臺灣的土地制度，就是從「人少地多」，慢慢演變成「人多地少」，在這長程的變化中，不同的條件，架構為不同的形態；中華民族的開拓與開展過程，臺灣有其具體而微的再現，反應了整個過程。

第二個特點，是從清末，經過日治時代到今天，中國走入了現代的世界與文化。臺灣有中國最早的現代都市設計——臺北市，格局與舊長安城的規劃是不一樣的，臺北市是針對今日的條件而設計的今日都市，其道路、房子的格局、樣式，都是先規劃好的；而臺灣也是亞洲最早農業革命的地區。不論綠色革命正負評估，日本治臺期間為了農業的發展，對化學肥料、現代水利設備、育種、選種等農業推廣，不遺餘力，而這種有意識、有理性的推廣現代的農業革命，臺灣是引導了整個東方世界。

第三個特點是近四十年來，臺灣與大陸分離的情況下，走出了自己的路。這與中國過去走的道路不一樣，也與另一批中國人走的不一樣，這條路走的很艱辛，但也走過了。過去以為臺灣是與大陸平行，或是大陸的延伸，而今臺灣是以其獨特的形象和發展動力，更以與大陸不同的方式和態度的臺灣模式，進入了現代的世界體系。

此外，本人對臺灣研究提出幾點幾個觀望的角度：

一、臺灣遠古以來不僅是亞洲東方大陸地盤的中點，亦是海洋南北通道之據點。近來考古的發現，卑南、十三行遺址，都說明臺灣具有海陸雙重的特性。而有此特性的族羣，除了其文化有自己獨特的特質，以及文化滙同的交流外，臺灣更以自己的情況，不僅為東亞、東北亞研究的重心，更是以環太平洋地帶為著眼研究的範圍。

二、世界化的經濟體系中，有一重要的海上管道，是由非洲到印度、到東南亞、到中國大陸、到日本的區域經濟連繫。在此一地區，我們可以研究臺灣在鄭成功時期，及其政權結束以後，當年大批船隊的去向？因為船隊是鄭成功時期維持臺灣經濟獨立的勢力，而滿清入臺後，大批船隊散到那裏去了？建立了什麼據點？這一部分的研究可以說是重建一個很龐大的國際經濟網中的一環。若能結合東南亞考古、民族、傳說的研究，不僅可以找到線索，明瞭當時的經濟情況，對於此一區域的經濟的全貌，也有相當的貢獻。臺灣在鄭成功時代的經濟研究的重點，不全是以大陸與臺灣政權的對抗，或是忠於明朝與外族的對抗，作為主題，這一段臺灣史，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做研究，可以看到新的問題，更能了解事實。

三、日據時代的發展，也有很多需要研究。日據時代臺灣有很獨特發展，在此我們不能一筆勾銷，只把日本人作為佔有者、統治者，而抹殺了中國、日本文化與民俗在臺灣的結合。換言之，我們對此時期的研究，不能只著眼於殖民地的剝削、壓制或是本地同胞對日人的反抗為主

旨，因為這中間日本人與本地同胞共同構架的文化，不少我們值得注意與珍惜的成績。此外，我們更要避免，不能單單研究對日據時代的每一點，來突顯今天對中國大陸政權的不滿，或是以日據時代留下的痕跡與影響，來突顯臺灣是完全孤立於中國之外，而且與中國不一樣的東西。日據時代是一個中、日文化交流結合的年代，不是那一種文化可以單獨變成主流的。

四、戰後的發展：1945年以後，我們曾經歷一段民窮財盡、經濟崩潰的悲慘時候，其中還有令人傷心的二二八事件，而且1945年後，為防止中共之侵略，也有過極權政治下之壓治和恐怖政權，這五十年來有悲有喜，重補這一段，我們要以心平氣和、公正的立場，多方面的去探討，不要片面強調政府的領導功能，或片面抹殺新移民的功勞；以本地同胞攜手合作的外省人的努力、以及大批本省同胞努力的成績，作為這一時期對臺灣發展的過程與特色，當可有多一份的瞭解。

五、四、五十年來，臺灣在思想方面的重整，也經過了一條坎坷的路途，其中對中國文化的回顧與展望、檢討與反省——中國文化究竟遭遇到什麼困難，才會有今日的痛苦，來做為殷鑒；同時，臺灣與世界長期的接觸，引進世界各地的文化，其深度、廣度、豐富度，遠不是當年上海、廣州……或五四時代所可以比擬的，也不是1945至1949年之間可以比擬的。這種接受外來的思想，在世界史上，是相當少見的，而由於臺灣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殖民地，所以進入的東西，百無禁忌，這一個特點，給思想界百花齊放的空間，甚至將不同時代的外面發展的文化，同時引進臺灣造成了新的辯論，濃縮成平面的對抗，以此作一新的嚐試與新的整合。

以上的幾個層面，應該在不預設立場與結論下做研究，否則將淪為教條與束縛，不是學術研究的態度。

臺灣地小人才多，相對於廣土眾民的中國、以及更廣大的東南亞，

而且整齊集中。由於連繫的方便，彼此的接觸與辯論，可以重建許多理論；舉例言，經濟的發展，是否與強大的中產階級有關，而強大的中產階級，是否與民主化有關？在過去的研究，經濟的發展一定要配合中產階級，而且迅速的發展經濟，更要有強大的領導，甚至堅強的規劃，但臺灣的發展，卻沒有規劃，例如中小企業如「螞蟻雄兵」，無孔不入，也有其強處。以前以為富了，才可以談民主，而近期的看法是富了也不一定對民主有好的幫助，因為金錢與權力互相轉價時，是否對民主的推行有正面意義呢？

理論可以研究，但不可以全盤移植，例如工業化的過程，中南美洲的模式，若套在臺灣身上，也很多需要修正。理論是可以研究的，但套用理論是沒用的，日本、香港、韓國……深圳等，每一個皆有其自己的模式，而且每一個擺在一起研究，或與臺灣對比，當可建構更多新的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互因，以新的假設，印證於學術研究，更可以田野調查的縝密與細緻，探究出更多的真象。

我們研究臺灣史，不要只局限於三、五個主題來當作是焦點的工作，臺灣雖小，但學術研究的天地很大，深盼此會有一個完美的開始，而不是終結，這只是第一屆，將來會有各種不同的主題在此討論，也期望不只在嘉義的中正大學，而是在各處都有同樣的討論會。謝謝各位！

導 言

宋 光 宇

「臺灣經驗」是目前大家都能朗朗上口的名詞。它的含義究竟為何？卻是沒有人仔細的研究過。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標榜以「臺灣史」為它的發展重點之一，於是在創所的第一年，就召集各方學者，齊聚一堂，共同商討什麼是「臺灣經驗」。經過兩天七場的研究討論，與會的學者大體上可以接受一個較為寬廣的定義，那就是說：

所謂「臺灣經驗」，從廣義的角度來說，應該是指從民國三十九年（1950）起，持續四十多年，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由於在經濟方面呈現快速的成長和繁榮，導致在社會、文化方面發生一連串多元的連鎖反應，達到均富的理想，並且導致政治結構的重組和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

至於狹義的定義，就是單指經濟發展而言。這次學術討論會就是讓不同學科的學者從自己所熟悉的研究領域出發，探討各自的「臺灣經驗」。因此，涵蓋面相當廣泛，從基本的理論架構到區域性的實證研究，雜然並陳，但都能圍繞在同一個主題旁邊。

研討會上所發表的論文，大略可以區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有五篇文章是在討論「臺灣經驗」的歷史背景。其中三篇更為整個研討會的「歷史文化論」奠下理論基礎。其它的文章則是分別從不同的研究領域來探討什麼是臺灣經驗。因此，這份論文集就分作兩冊。有一冊專門探

討歷史文化背景，作異時限的分析；另一冊則是作同時限各學門並進的討論。兩冊之間並沒有絕對的相互關連。讀者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選讀其中的一冊。當然，最好是兩冊都讀，才能窺得堂奧。

對於「臺灣經驗」的研究，並不是始自這次研討會。在幾年前，就已經有外國學者注意到臺灣的經濟、社會、政治、以及其它方面的發展情形，當時用的稱呼是「臺灣奇蹟」(Taiwan miracle)。研究方向都是側重在同時限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層面的分析。但是，我們知道，任何社會的發展都與它本身的歷史文化有密切的關係。一個講求「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民族是不可能高度的經濟發展。今天，我們探討臺灣的經濟成就，倘若忽略了它的歷史文化背景，也是不能全面的瞭解它的真正涵義。

第一冊的前三篇文章是要為「臺灣經驗」找尋歷史、經濟方面的根由。

宋光宇的〈重利與顯親：有關「臺灣經驗」各家理論的檢討和歷史文化論的提出〉一文，明確的指出，今天所謂的「臺灣經驗」，在歷史淵源上，是十七世紀以來閩南「重利經商」風氣的發揚光大；在心理動機上，是秉承傳統中國人對自己家族的一份天職——為人子孫者要能繼述父祖的志業、維繫家門於不墜、最好能更進一步的以自己的功業來提升家族的名望和社會地位，完成「揚名顯親」的使命。

在檢討相關各家理論時，宋光宇把「臺灣經驗」和「中國可不可以現代化」這個命題作等量齊觀。在檢視「中國可不可以現代化」這個命題的各種答案時，則清楚的看到，答案的內容實際上是隨著中國國勢的強弱而有所變化。

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淪為世界列強的「次殖民地」時，西方的學者認定中國是絕對不能走上「現代化」這一條路。舉凡中國的家庭制度、語言文字、儒家思想、宗教、行政體系、科舉考試……等文化項目，都

被視為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因素。

到了1960年代，國際學者們比較中國跟日本的現代化過程，問：「日本在歷史上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為什麼日本可以現代化，而中國卻辦不到？」從而有「日本能而中國不能」的論點。歸因於兩國的社會、文化上的差異。例如，日本是由一個子女來繼承全部的財產，而中國則實行諸子均分財產的辦法，所以，日本可以長久保持龐大的資本，而中國卻不能長久累積資本。

一直要到1980年代，臺灣、南韓、香港、新加坡等「亞洲四小龍」崛起，學術界才有人警覺到，原來現代化這件事中國人也能辦到。一時各種理論雜沓而來。大體上，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借用歐美現成的理論，硬套在亞洲四小龍的身上。最常用的理論是從巴西、阿根廷等國發展出來的「依賴理論」。也有人指出，亞洲四小龍曾經淪陷為日本的殖民地，在那時候奠定日後工業發展的基礎。因而有「日本殖民地」理論。

另一類的學者則是企圖從四小龍本身的歷史文化裏面去找尋能夠促成他們經濟發展的文化因素。這方面的學者包括 H. Kahn、S. H. Alatas、Peter Berger、費景漢、余英時等人。他們認為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現代化，儒家文化發揮了不可磨滅的功能。這些學者的研究多半偏重哲學或社會學的探討，忽略了與臺灣經驗有直接關連的歷史事實。

宋光宇用十九世紀下半期臺北大稻埕的長期外貿順差為例，指出在日本佔領臺灣之前，臺灣已經從事國際貿易，享有鉅大的厚利。他並且追溯這種外貿現象的源起至十七、十八世紀閩南商人的重利經商風氣。

同時，他也試著把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基本命題約化成：「人如何憑著自己的事功來榮耀上帝，從而證明自己將可獲得最後審判時的救贖。」並提出一項可資對應的新命題：

「中國人如何憑著自己的功業來榮耀祖先，進而獲得在家族中永恆不朽的地位。」宋光宇指出，傳統的「揚名顯親」概念，是隱藏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的「天命」，實是促成每個人奮發向上的原動力。他指出，「重利經商風氣」和「對自己家族的一份天職」兩者共同構成創造今天「臺灣經驗」的歷史文化基礎。

林滿紅的〈臺灣資本與兩岸經貿關係（1895-1945）——臺商拓展外貿經驗之一重要篇章〉一文，則是很清楚的告訴讀者，造成今天臺灣經驗的直接源頭是清代和日據時代的臺灣商人。文中指出，在日據時代，由於原有的大陸資本衰退、英美資本式微、以及日本資本並未取得絕對的優勢，以致臺灣商人有絕佳的機會乘勢崛起，縱橫於臺海兩岸。這些商人的子弟大多能克紹箕裘，成為民國四十年以後，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骨幹。

林滿紅也指出，臺商在日據時期海峽兩岸的經貿關係中，累積了很豐富的外貿經驗。他們也藉此機會建立起與大陸、日本、以及本身的人際關係。拓展直接貿易與投資；用股票來募集資金；以開博展會、迎神賽會、廣告等活動來促銷商品，帶動地方繁榮；領悟到公司有在經營者家族之外的生命；在對外的經貿活動中，對於政治認同、文化認同等問題，能夠做相當靈活的處理，都是光復以後臺灣外貿發展上不可忽略的一頁歷史背景。

中央銀行謝森中總裁則以「臺灣經驗」見證人的身分，在閉幕演講中，講述他的經驗和看法。他個人認為，這四十年來的發展是「迷迷糊糊的走過來的，並不是事先有縝密的設計。」事後分析起來，造就今天臺灣經驗的原因大致是中國人的固有的勤儉美德；傳統的儒家倫理；社會安定、政治安定、教育普及；美國的援助；後來者的優勢；循序發展與整合策略之正確導向；土地改革成功的特殊案例等項。

謝森中也指出，臺灣的經濟發展過於快速，在社會、文化方面產生

許多失調現象，諸如：工業技術升級的速度跟不上經濟成長的速度；忽略了環境保護工作，以致社會大眾付出可觀的社會成本；土地問題失控，快速致富的心態和好逸惡勞的惡習，正逐漸成爲經濟發展上的隱憂。

宋、林、謝三人的文章，基本上，已經勾勒出本次學術討論會所要揭櫫的「歷史文化論」的理論基礎。

柯志明提出兩篇互有關連的文章，〈殖民經濟發展與階級支配結構——日據臺灣米糖相剋體制的危機與重構（1925-1942）〉和〈「米糖相剋」問題與臺灣農民〉，是從「階級衝突」的角度來談日據時代米、糖兩項產業的農民組織結構。他指出，糖業是完全由日資企業所控制，本地原有的糖廠難逃被兼併的命運；而米業，特別是米的加工業，卻由於利潤低，日本總督府消極對待，原有的土壟間碾米業反而結合商業、金融等功能，有力的抗拒日本資金。在日據後期，稻作面積擴大，米農收入增加，使得蔗農改種稻米，或者向日資糖廠要求較高的蔗價，以致日本人控制蔗農的辦法在 1920 年以後逐漸瓦解。

第二冊則是分成「思想」、「宗教與社會」、和「區域研究」三大部分。蔣年豐的〈戰後臺灣經驗中的存在主義〉、熊自健的〈戰後臺灣的自由主義與海耶克思想：以殷海光、夏道平、周德偉爲例〉、和彭小妍的〈臺灣七十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三篇文章構成「臺灣經驗」中有關思想以及政治發展局勢的一頁。

蔣年豐指出，在民國四十年代，撤退到臺灣的國民政府藉著「戒嚴令」的實施，建立嚴厲肅殺的政治格局。到了民國五十年代，政權逐漸穩固，社會也趨於安定。因而這時候的臺灣從官方到民間，都逐漸擺脫戰亂、飢餓、流亡的心態，開始認真的從事建設和生產。這時候，官方開始著手進行第三期的四年經濟建設計畫，由於受教育的人口增加，人口往都市集中，在民國五十年代末，臺灣就已經完成以勞力密集、工資

低廉、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初級工業社會的準備。臺灣內部雖然日趨穩定，但是由於堅持「漢賊不兩立」原則，使得它在國際上逐漸走向孤立的處境。在這樣情況下，臺灣的文學先是有民國四十年代以「反共抗俄」為主流的戰鬥文學；在五十年代，則是以西洋思潮為主流的現代文學。標榜虛無、空虛的存在主義，在民國五、六十年代，盛行一時。一直要到民國 59 年的「保衛釣魚臺（羣島）運動」，這種局勢才有新的轉向。

國民政府並不領情參加保釣活動者所表現出來的大中國情操，甚至懷疑他們要求統一的情感有與中共掛勾的意圖，部分島內保釣人士深受挫折之餘，不得不從虛懸的民族主義回到現實社會。於是他們結社組團，上山下海，到農村、工廠、礦坑實地去調查瞭解，親身體驗中下階層民生的艱苦。於是有「鄉土文學」「報導文學」的產生。這種現實化「糾正了虛無縹緲的民族情結，把注意力從仇外的愛國迷思轉換成對社會、現實、人民、生活的擁抱熱情。擁抱現實、社會參與的呼聲，不但團結了知識分子，也把知識分子的言行與農工等民衆的權力和利益結合在一起。這種現實化，成為臺灣社會最重要的蛻變之一。」作者更進一步的指出，「就是這種力量滙聚成向萬年國會、軍事戒嚴統治挑戰的洪流，並迸發出建立民主法治社會的呼聲。這些力量結合成前仆後繼的政治反對運動的勢力，並逼使官方做某種程度的回應，而有所革新。」

熊自健的文章，〈戰後臺灣的自由主義者與海耶克思想〉，強調殷海光、夏道平、周德偉三人在民國五十年代極力闡揚海耶克的自由主義，其目的是在「抵抗共產主義」。作者說：「戰後臺灣的自由主義者之所以特別青睞海耶克思想，是因為海耶克提供給他們一整套反共的理論和一整套自由的理論。這是流亡於臺灣的自由主義者，在飽嘗中共的威脅與法西斯的陰影下，感到最迫切需要的思想武裝，以此來抵擋馬克思主義的氾濫，並引導臺灣當局肯定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而走出法

西斯的陰影。」

可是海耶克的自由主義在戰後的臺灣並未能成爲顯學，原因很多：政府不重視它；沒能正式在學術殿堂上講授；作品只譯出一部分，導致研讀海耶克思想時，缺乏相關資料而不能深入探究，甚至於讀不懂海耶克的著作；海耶克學說所批判的福利國家、西方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問題，在當時的臺灣尚未出現，以致使它有英雄無用武之地。

彭小妍的〈臺灣七十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一文，基本上，是承續蔣年豐那篇文章，講述繼「存在主義」而興的「鄉土文學」，主要是發生在民國五十七年的一場論戰。指出這一時期的論戰主要的論點包括：本省籍與外省籍的劃分；民族主義與西化的對立；標榜「民族精神」和「現實主義」等理念；「殖民經濟」和「文化附庸」等。論戰期間雙方互扣帽子，結果使得一場文學討論變成意識型態的對抗。

這三篇文章提供我們另外一種的「臺灣經驗」，從思想層面來探討臺灣四十年來的一些變化情形。而它們的具體表現就是近十幾年來的「臺灣中心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在政治上形成一股風暴。但是我們迄今仍沒能平心靜氣的探討過這個課題，以待未來之有心人作這方面的研究。

李明輝的〈牟宗三思想中的儒家與康德〉則關心傳統儒家在這四十年臺灣這塊土地上，是如何生生不息的發展。李明輝這篇文章，企圖透過康德的思想來瞭解牟宗三所講的新儒學究竟是什麼。他指出，牟宗三在第一個階段藉用康德哲學來建立一個完整的思想架構，以便爲儒家的「內聖」之學定位，並且疏解其「外王」問題。此處所說的「外王」是指民主與科學，稱之爲「新外王」。表示此處需要對傳統的儒家思想格局有所突破。在第二個階段，由於牟宗三對於康德的著作做了深入的研究，特別強調要透過康德哲學來會通中西哲學。李明輝認爲，牟宗三在融會貫通康德哲學與儒家思想所獲得的成就，爲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相互適應方面，做了絕佳的典範。

至於「宗教與社會」部分，一共收錄了三篇文章，主題各不相同。李豐楙的〈臺灣中部「客仔師」與客家移民社會〉一文，是在檢視臺灣各本方志中，對於客家人聚落中的巫師，「客仔師」，作史料分析。康豹的〈戰後王爺信仰的演變〉一文，則是以屏東的東隆宮和臺北的三王府為例，來說明臺灣的經濟發展並不一定都為神壇寺廟帶來正面的影響。東隆宮的發展情形是典型因經濟發展而受益的例子，而臺北的三王府的際遇卻正好相反，由於地價上升，屋主要拆屋改建大樓，而導致三王府流離失所，主事者為找房子而頭痛不已。

宋光宇〈試論四十年來臺灣宗教的發展〉是綜合討論戰後臺灣及幾大教大派的發展情形。他指出，四十年來主要的發展趨勢有二：其一，是西洋教派先盛後衰，交界點是在 1965 年前後。以後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有下降的趨勢。教徒人數一直未能突破一百萬人的關卡。其二，本土教派則是跟隨經濟發展的脚步一起勃興。時間上，大致相差三年。寺廟總數的增加總是落在經濟起飛三年之後，每當經濟停滯時，寺廟的發展剛好到達鼎峰。三年後，在寺廟增加的曲線上出現平原時，經濟即開始上升。國民所得增加愈快，寺廟的增加也相對的增快。宋光宇指出，這種現象正顯示本土宗教對於工商社會可以作良好的適應，而外來的基督教、天主教，由於教義的隔閡和各宗派本身在西方社會的發展經驗不同，對中華文化和臺灣社會有不同程度的適應不良的現象出現。

第三部分是「區域研究」。主要是以東勢、高雄、和嘉南大圳為研究對象。溫振華探討了乾隆年間漢人如何越過土牛紅線，入侵大甲溪中游原屬山胞居住的地方從事開墾。他認為早先的「私墾」和「軍工採料」是引發這波開墾浪潮的主要原因。在組織類型上，以漢人用個人身分向山胞承租土地的案例為最多；也有數人合夥者。若是二、三十股共同承墾，則是先分成幾大股，各大股再招若干小股。這種方式說明了臺灣鄉村的基本特質。

戴寶村研究〈高雄港的建設與發展〉，指出臺灣的港口市鎮由早先的各河口自成港口的分散狀態，逐漸集中到基隆和高雄南北兩港。兩港的港埠建設和南北縱貫鐵路與公路的開通，改變了舊有的市場體系，和東西向的商品流通導向。在這種情況下，舊有的港口逐漸沒落，新式港口因而興起。1920年南北兩港的局面就確立了。

溫振華以日據中期高雄地區的戶籍資料，細緻的考察了那時候高雄地區的人口移動情形。

黃俊傑則以女詩人黃金川的《金川詩草》為中心，檢視日據時代臺灣詩人的故國情懷，以及黃女士對社會的關懷。在結論中，他指出，《金川詩草》具體而微的展現臺灣文化作為中原文化之延續這個層面，在社會關懷方面，也展現某種寫實主義的取向。

古偉瀛在考察嘉南大圳七十年來的人事變化時指出，在日據時代，日籍職員的教育時間平均比華籍職員多三年，以致日籍職員可以擔任較高的職位。華籍職員的工作年限要比日籍職員多出一倍。戰後的任職時間又比戰前高。這跟外在的大環境有關係。結果是造成這個機構人口結構的老化。他在另一篇文章檢視了嘉南平原百年來的水災出現頻率。

另外，沈清松的〈從文化觀點看臺灣經驗〉一文，係以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做對比，發現文化建設甚為不足，因此不從文化建設方面討論臺灣經驗，轉而從「生活世界」來談臺灣地區的文化構成。

所謂文化建設，是指政府對社會及物質條件從事行政等技術性控制導引而成的文化狀態，猶如經濟建設那樣。生活世界則為民衆生活之具體實踐。此一區分乃延續胡賽爾、哈伯馬斯等人之研究。沈清松借用「生活世界」的觀念，從系統、歷史、體驗三方面來論析臺灣的文化構成。他把臺灣看成是「前現代」、「現代」、「後現代」三者並陳的社會，價值信仰體系日益世俗功利化，缺乏秩序與美感。但是，這種文化將來可以通過兩岸交流，在「現代化」及「中國特色」兩點號召下，傳播至

中國大陸上。

綜合以上兩冊各篇論文，我們可以說是對「臺灣經驗」有了初步的認識。這個經驗有它甜美溫馨的一面，也有苦澀痛心的一面。我們探討臺灣經驗不能只看一個方面，那樣會使我們的觀念有所偏頗。坊間流傳的那些哭哭啼啼的臺灣研究，就是犯了這個毛病。這次研討會與會的學者試著呈現給讀者一個全方位的研究觀點和成果，以扭正不良的風氣。

這次臺灣經驗研討會是由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毛漢光所長與黃俊傑教授共同策劃，分頭接洽各方學者撰寫文章，來共襄盛舉。黃俊傑教授原本任職臺大歷史系，為幫助中正歷史所的新設，而同意借調一年，並全力策劃這次研究討論會，倍極辛勞。毛所長獨具慧眼，以嘉義是臺灣早期開發的地區之一，中正歷史所新設在這塊土地上，自有其特殊的意義，環顧臺灣各歷史系所，無有以臺灣史為發展重心者。毛所長毅然放下隋唐史專家的身段，為臺灣史研究的發展作為馬前卒，這份豪情，更是難能可貴。在出書的前夕，謹記數言，以誌這段因緣。